

王朝

间的对话

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

《阴晴史》导读

上卷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导 言

朝鲜高宗于 1881 年派领选使金允植到天津，与李鸿章等会谈。与金允植对话的，包括北洋大臣李鸿章、候选道马建忠、永定河道游智开、天津器械总办许其光、天津海关道周馥、天津军械所总办刘含芳、招商局总办唐廷枢、青年军官袁世凯。张树声、吴长庆、罗丰禄等一批高级官员以及德国人穆麟德等人也分别和金允植展开了会谈。他们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朝鲜王朝如何借鉴中国的经验，发展洋务。李鸿章劝朝鲜发展经济以自强，并建议其设立外语学校，设立海关。经李鸿章的推荐，德国人穆麟德去了朝鲜，成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籍的海关官员。金允植回国后著有《阴晴史》和《天津谈草》。

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祖籍清风。金允植 1835 年农历十月初三日出生于京江的荳湖。他是领相（首相）金埴（1580-1658）的第九代孙。其曾祖父是敦宁参奉、赠吏曹参议金基建，祖父是赠吏曹参判金用善。其父亲金益泰（赠吏曹判书）、叔父金益鼎都是朝鲜王朝的高级官吏。因其父母早亡，金允植姐弟等被叔父收养。其叔父金益鼎曾任星州牧使、

兵马金节度使，为通训大夫（三品官）。后被封为清恩君。1864年，金允植进士小科及第，1865年以恩荫为健寝郎，1874年文科大科及第。后历任黄海道暗行御史、顺天府使、江华留守。1881年被高宗派为出使清国的“领选使”。在中国天津与著名的洋务派领袖人物有长时间的谈话。回国以后积极参加朝鲜的各种洋务活动，先后被任命为经国事务衙门、通商事务衙门协办，工曹判书，兵曹判书，中枢院副议长、议长，经学院大提学。还曾任皇室制度局总裁，皇室会计监察院卿，《国朝宝鉴续纂》纂辑官兼校正官。金宏集内阁当政期间，他充任外部大臣，掌管朝鲜国的外交诸务。金允植参与并推进了朝鲜国许多方面的现代化制度设计。如创立了机器局、现代海关，参与了外交、外贸、军队、会计等多种制度的建设。其间因“乙未事件”被流放到济州岛与智岛一带近十年，后被放还。1908年7月到9月，陪同英亲王殿下访问日本，与日本许多文人有唱和。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吞并朝鲜，把朝鲜高宗皇帝封为“德寿宫太王”，同时为总督府的重要官员封爵。金允植被封为子爵。同年，他作为最早加入日本学士院的朝鲜人，被选为院士，后又任“大同教”总会会长。

金允植有《云养集》《阴晴史》《续阴晴史》《天津谈草》等著作传世。他于1922年病逝。金允植次男金裕问整理有《云养公家状》，比较详细地记录了金允植的一生。

如同我国的李鸿章一样，金允植在自己的祖国也是一直被争议的人物。早在金允植被流放之前，在汉城医院前围攻的人群里，就有“惩办国贼金允植”的口号。在他去世以后，如何安葬他引发了一场争议。如今的韩国学术界对于金允植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金允植是一个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封建文人，他最终倒向日本，成为了一个亲日派的领袖人物。这样

的一个污点是金允植永远也无法洗清的。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辩证地看待其功与过，认为金允植不仅是韩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人物，他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也充分表现了朝鲜民族的不屈气节。他不仅坚决反对日本的吞并，而且在其后自认为是“亡国大夫”，称病闭门不出，使得朝鲜总督府的中枢院副议长之位置空缺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在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中，金允植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警察曾经搜查他的住宅。后因“独立宣言”而被日本人宣判入狱的人中，李容植是经学院副提学（金允植长期充任经学院大提学），金裕问是其次子，金麒寿是其养孙。还有其他一些参与起草“三一独立宣言”的人，也与金允植有密切关系。（参见金圣培《金允植政治思想研究》，首尔大学校博士论文，2001年）

金允植的天津来往日记，是他还没有亲日思想倾向时期的记录。在与李鸿章等中国洋务派领袖人物的对话里，金允植也反复指出，朝鲜与中国都要提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金允植出使中国，是在朝鲜王朝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动身的。当时的朝鲜，东有日本的武力威胁，北有俄国的虎视眈眈。甚至美国、德国和英国等，也趁机要求与朝鲜通商。当时的朝鲜国王是高宗李熙。但是高宗的王宫内外也不太平。作为五百年李氏王国的传承者，高宗幼年登基。其王权最初完全掌握在其父兴宣大院君李应昱的手里。高宗亲政以后，其王后闵妃与大院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朝鲜王廷已经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金允植《天津奉使缘起》详细交代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原因，以及他在天津的各种活动。他说：“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中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于是中国及日本皆与泰西各国修

好。所立约者近二十国。”（[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93卷，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06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首先一改其蔑视西洋的做法，积极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很快就成了东方的强国。日本天皇派出的使臣以“敕”“诏”等字眼的文书来递交朝鲜。朝鲜王朝十分气愤，以其书契不符格式而却之八年。到了1876年（清光绪二年丙子），日本使臣随兵船进入江华岛，强迫朝鲜接受其条约。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大肆扩张，成了朝鲜的近邻，对朝鲜虎视眈眈。金允植说，中国一直把朝鲜看成是等于“内服”者。李鸿章屡次致函于李最应与李裕元二领相，劝朝鲜实行“联美亲中”的策略。1880年（清光绪六年庚辰），天津海关道台许藻如以李鸿章的意思写成了一封书信，交给了来中国朝贡的使臣。高宗深以为是。但是，朝鲜国内的保守派势力很大。他们强烈反对与美国立约。到了次年，才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在秘密的情况下，选了一批学生来天津学习。同时，派顺天府使金允植来充当燕行使正使。

金允植一行于光绪七年辛巳九月二十七日（公元1881年11月18日）离开汉城，十月十六日渡过鸭绿江进入我国境内。光绪八年壬午七月初十日（1882年8月23日），因为朝鲜国内发生军变而临时回国。同年九月二十九日（1882年10月18日）再次回到中国，十月二十九日（1882年12月9日）才最后回到朝鲜。金允植一行在中国的留居时间将近一年。金允植在天津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他们的讨论话题十分广泛，涉及到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朝鲜国内的各个方面。但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朝鲜以后的发展方向。李鸿章劝朝鲜发展经济以自强，并建议其设立外语学校，学习西方。

金允植在中国的活动，是朝鲜王朝特派“领选使”与中外

人士的天津对谈。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对话，是一次长时间的跨文化话语撞击。对谈的时间跨度达到了 300 多天。这也是关乎朝鲜国命运的旷日持久的对话。是在殖民与反殖民、封建与反封建的大背景之下，在中国、朝鲜、日本、美国、俄国、德国、英国之间展开的“七方会谈”。此次朝鲜使节与清朝大臣之间的对谈，依然是局限于彼此是具有藩属朝贡关系的谈判。从李鸿章等的角度来说，并不把金允植等当作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还不是对等的外交谈判，而仅仅是此类型外交谈判的建立之开端。从情感上说，清朝的大臣也是把金允植等看作是自己人的。金允植回国以后的 1884 年，朝鲜高宗宣布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1897 年 10 月，高宗祭告天地，登基称帝，年号为“光武”，国号为“大韩帝国”。从此时到 1910 年日本全面吞并朝鲜这段时间内，朝鲜王廷已经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金允植自己则是把他此次的中国之行看作是祖国自强之路的一次难得的探究历程。

中国的“洋务派”不能把中国从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自称善于“打补丁”的李鸿章也无法为满怀希望的金允植指出一条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来。金允植等朝鲜王朝的“洋务派”也照样无法挽救以高宗为代表的封建王朝的危亡。1910 年，日本全面吞并朝鲜。

金允植的思想，是典型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金允植的记叙，是典型的汉文游记体文字；金允植的诗歌，也是典型的朝鲜封建士大夫的诗歌。他在中国的行程，与他在日本的行程一样，都不仅仅是完成他的肩负的王命，而且是他探求救国救民的“天路历程”。金允植自小失去了父母，在叔父与叔母的关爱下成长。十六岁以后，他投到当时朝鲜九大儒学派别之一的凤栖俞莘焕门下学习。他还是朴珪寿的得意门生。其诗歌、书法、

小学、医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造诣都不仅为本国人所推崇，也为中国、日本文人所敬佩。日本人细井肇《现代汉城的风云名士》一文里不仅称赞金允植的学问，还称赞他身材硕长，银发长髯，一副隐士风度。从《阴晴史》《天津谈草》等著作的记载里，可见细井肇的说法不虚。金允植的中国之行记载，与他的其他诗文一样，是理解其思想演变轨迹的重要线索，也是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它们也是东北亚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

本书选用底本为 1955 年韩国国史编辑委员会编辑之鱼允中、金允植《从政年表·阴晴史》。金允植《阴晴史》单独计页。该书页长 21 厘米，共 230 页。笔者是 1996 年第一次见到此书的。1996 年到 1998 年，笔者奉派到韩国首尔（汉城市）的崇实大学任教。该校离国立中央图书馆比较远，但离首尔大学（SNU）很近。首尔大学是韩国排在第一位的国立大学，那里有韩国最著名的国学图书馆“奎章阁”。金允植的《阴晴史》就在阅览室的书架上。但两年的时间实在太短，《阴晴史》也只是翻翻就放下了。在此期间，崇实大学的吴淳邦教授给予诸多帮助。吴教授是台湾大学的中文博士，专门研究我国晚清小说。我在崇实大学任教期间，他即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研究专著。

1998 年回国以后，我并没有中断和韩国学者的联系。随着中国与韩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发展，我们的交流更多了。在我所居住的天津六里台和万德庄，一大批餐厅、书店、百货店都有韩语标牌。因为我妻子到韩国首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天津师范大学领导为照顾我的生活，2002 年再次派我到崇实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我接受了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朝韩卷的写作任务，还荣幸地成为该丛书的编委。这次，我可以比较专心地读韩国先哲们的著作

了。所幸的是，林基中教授主编的《燕行录全集》已于2001年由韩国的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出版。我在其中见到了金允植后人手书的《天津谈草》。当时的感觉真是如获至宝。身在异国他乡，却可以在自己的研究室里读一百多年前朝鲜文人所记录的天津，其亲切感真是无法形容。金允植和韩国历史上第一批近代留学生所居住的东局，现在的地名是东局子，我家在那里曾居住过四年半。我所住的临营西里后面就是军营。我甚至猜想，金允植的宿舍就在我那栋楼的下面。我现在所住的六里台，与曾经设立“朝鲜馆”的天津机器局南局（地址在海光寺）只有不到一站地的距离。

笔者于2004年8月回国。所撰《半岛唐风：朝鲜作家与中国文化》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同年9月出版。研读金允植《阴晴史》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原书错误很多，只好边读边改。并非笔者对韩国前辈学者不恭，原书错误较多的情况实乃时代造成。1955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鱼允中、金允植《从政年表·阴晴史》就已经出版了。由时间上可以推知，原书的标记与断句工作，是国史编辑委员会的诸位先生们在炮火声中完成的。另外，金允植的原稿是毛笔书写，本身就不一定清楚，而且朝鲜语是拼音文字，一个朝鲜语文字可以代表几个、几十个汉字。即使是饱读诗书的国史编辑委员会的先生们，假如没有来过中国，也很难判断出“北京永□门”中间缺的是什麼字。他们对于天津的河北大街、大直沽、紫竹林的情况所知更少。况且，金允植的这些记录，都是在朝鲜王朝和清王朝都很不安定的形势下书写下来的。除了公文、奏报和条约外，其他的文字几乎都是一挥而就写出来的。金允植自己也是用朝鲜语思考，而以中文写作的。他的许多汉字的书写前后并不一致。

金允植到天津来，名义上是来中国学习工业制造，实际上

是来中国学军工制造并与李鸿章等会谈的。金允植到天津的另外一项使命，是与李鸿章探讨如何应对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外交与通商要求。其中许多会谈，都是两国的最高机密。金允植与袁世凯的很多谈草因为涉及军事秘密，当场就烧毁了。还必须说明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吞并了朝鲜以后，推行奴化教育。朝鲜国学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所受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鉴于上述原因，我以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金允植《阴晴史》原书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文本。它是一个书写之后又被书写的文本。其中充满了“文本间性”。我以为，看一看120多年前中国与朝鲜两个即将灭亡的封建王朝间进行了什么样的对话，看一看朝鲜王朝如何在现代与封建、开放与封闭的十字路口进行抉择，看一看朝鲜王朝的文人是如何书写这些对话的，是十分必要的。

附录收录的是笔者指导的天津师大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卢庆侠写的论文。该文所论述朝鲜王朝的书写转型问题，相信会对理解金允植的汉字书写有一点帮助。

金允植《阴晴史》分上下卷。笔者将明显属于韩国国史编辑委员会诸位先生所注称“原注”，明显属于金允植书写的则称“原文”。“原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用汉字作注，一种是用韩文作注。后一种情况我都将其译为中文，并标上“韩文”二字。本书内“韩文”“朝鲜文”是一个概念，都是指世宗大王所创建的朝鲜文字。笔者所称“原书”，即指国史编辑委员会1955年编成之书。

序 言

中朝邻邦，山水毗连，两国人民很早就互相往来，传说殷朝末年“箕子入朝，诗书从焉”一事，便见之于东国史书。自此以降，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而且两国人民皆爱好和平，外寇来犯时，双方同仇敌忾，彼此声援，并肩奋战，情同手足。这是人类关系史上光彩照人的一页。

历代史学家关注这些史实，时有著述公诸于世。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史笔趋于细致而深入，断代或个案研究渐渐形成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近代史研究尤得青睐。因为这时国际局势阴云密布，列强们虎视眈眈，觊觎中朝广袤而富饶的疆土，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成了两国人民的燃眉之急。他们审时度势，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以求克敌制胜，捍卫主权。描述并总结这段历史，不仅可以提供两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客观历程，而且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为今天迎接挑战、发展自己提供精神支柱。

治史自然离不开史实，而两国关系史的原始资料又有汉文和朝文两种文本。它们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理应互相补充，互相发明。所以，我国学者若能同时利用朝文资料，便能使自己的论述更加可信，论点更加坚实。刘君前不久曾有著作《半岛唐风》问世，令人耳目一新，这次又转向更为基本的研究工作——进行朝鲜文化史料的整理与介绍。当前关于文化史、思想史之类的研究方兴未艾，试图在抽象层次上建言立说者不乏其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说不管多么抽象，结论不管多么概括，都应该以史实为基础。唯有基于实证主义的观察和探索，才能归纳出无懈可击的史说和史论。

朝鲜虽是近邻，但在文化习俗、典章制度诸方面与我国多所不同。针对原始资料的难点和重点，刘君便做了不少注解和阐释，譬如关于原作者其人、其书、其政治抱负等等，凡是在他看来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的地方，都有详细解说，并做了大量的翻译与整理工作。因此，这本导读之作嘉惠士林的性质也益加彰明。

周发祥

二〇〇六年二月

《阴晴史》导读



金允植是在 1881 年 9 月 8 日接到朝廷命令的。《高宗实录》“辛巳闰七月十五日”有记载说“以金允植为领选使。”

“辛巳九月初一日，祠宇尚奉于腰辇，未得行朔参，极为未安。”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 1 页)

原书前有小注曰：“西纪一八八一。”

这是金允植出使中国日记的开始。这一天是 1881 年 10 月 23 日。“祠宇尚奉于腰辇”是说他的家还没有安顿好。“腰辇”是当时朝鲜普遍使用的人抬的轿子。朔，是农历的每月初一日。古代有朔参官的说法，是指能在朔日朝参的官员。“未得行朔参”一句是说，金允植自己的家还没有安顿好，所以没有去上朝，心里很不安。

初二日的情况，金允植没有记录。

“初三日。申刻，搬移于谏洞金直长楨均家。奉安祠宇。家舍共三十三间。价为一千七百两。但年久屋老矣。”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 1 页)

“申刻”是十五时至十七时。金允植于 1881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3 点以后，率领全家搬到了新的居住地。值得注意的是，金允植所说的

搬家，名义上主要是“奉祠宇”。他最不安的是，祠宇未安。他所作的事情，本来是花了1,700两银子买下了金桢均的住宅。但是，他所说的却是“奉安祠宇”。他的记载的背后，是在与民族对话，与国君对话，也是在与自己的家人对话。搬家就是搬家，金允植所说的“奉安祠宇”也不一定就是虚伪的托辞。因为朝鲜民族把家与家族看作是一体的。

谏洞是汉城的一个地名。韩国的首尔（即汉城）等城市至今还保留着此种地名。“洞”是古老的用法。其原来的含义大约就是山洞。今天在首尔市区里，“洞”是“区”下的行政单位。笔者曾任教的韩国崇实大学校就位于铜雀区上道五洞。

“直长”是负责管理印章、符节和仪仗的官员，属于尚瑞院。

“初四日，夕阴。推鞠为之。李载先自现就囚。”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页）

原书上有注曰：“李载先就囚”。

“推”与“鞠”都是审问、讯问的意思。“推鞠为之”就是进行了审问的工作。

李载先（？~1881）是兴宣大院君的庶长子，也就是高宗同父异母的兄长。当时，朝鲜有些人力图保李载先登基，废除高宗。安骥泳等官吏积极筹划，准备起事。但为广州山城将校李丰泰告发。事情败露以后，李载先来自首，被关押起来了。

后李载先被高宗赐死。

“初五日，出新门外，修人事。”

初六日，舍廊旁突修改。夜乍雨，有声而雹。”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页）

“修人事”，就是去拜访同僚。此处，“廊”当是回廊。

“初七日，昨日推鞠委官韩敬源遽请迟晚。有严旨，台疏继发。委官以洪领敦淳穆为之。”

初八日，推鞠为之。”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页）

这一天是1881年10月29日。本来负责审讯李载先等人的委官韩敬源突然在昨天请假说要迟到。高宗有十分严厉的旨意下达。随后，承政院也发来了通令。韩敬源的“委官”被撤掉，由时任领敦宁府事的洪淳穆兼任。

韩敬源当为“韩启源”。韩启源（1814~1882），字公佑，号草隐、柳下。1834年别试文科及第。1868年以后分别出任吏曹判书、平安道观察使。1874年为判中枢府事。1881年负责审讯李载先、安骥泳谋逆事件，任审讯委官。

按照朝鲜《经国大典》的规定，王朝设立宗亲府、忠勋府、仪宾府、敦宁府等。其中的仪宾相当于驸马。在高宗时期，领敦宁府事（也称“领敦宁府使”）是正一品的大员。

由“推鞠为之”的记载可知，审问高宗的兄长，是很难做的工作。韩敬源时任“判敦宁府事”。

“严旨”就是严厉的命令。高宗给臣下发的命令是“教”。“教”是会意字。从攴，从孝，孝亦声。“攴”的篆体像以手持杖或执鞭。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靠鞭杖来施行他们的教育与教化。其本意就是教育。但是，在古代的朝鲜王朝里，“教书”却是特殊的文体，它是国王的旨意。（参见拙著《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第197~19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由于我国的王制里没有类似的使用法，因此怀疑此字是箕子遗风。大约是箕氏朝鲜以后的遗存。现存《好太王碑》里也有类似的使用法。其碑文中有“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存时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远近旧民守墓洒扫。’”（方起东释读《好太王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二十代国王为纪念其父亲好太王建立的，其碑文的起草时间当是在公元414年。崔滋《补闲集》下十四也说：“元狩六年初作诰，告示大臣曰教。秦制也。”我国的昭明太子编著之《文选》“教”之注也说：“善曰：蔡邕《独断》曰：诸侯言曰教。”《文体明辨》里有对“教”的解释是：“按刘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翰云：教，示于人也。秦法，王侯称教。而汉时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属县是

也。”南朝梁之任昉《文章缘起》记载说：“天垂文，象人行事，谓之教。秦法，诸侯王称教。教效也。言出而民效也。《白虎通》：王者设教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补注：李周翰云：教，示于人也。秦法，王侯称教。而汉时大臣亦得用之。如出教告属县是也。故陈绛曾以为出教告众之次。”（《文学津梁》第一册，第22页，上海有正书局，1920年版）

当时的朝鲜王朝，在高宗之下，设立“议政府”，其首领称“领议政”，相当于首相。领议政之下为左议政、右议政，此三人同为正一品官。其下有从一品左右赞成、正二品左右参赞，以及舍人等。此外，还设有承政院，为大王起草旨意。原文里的“台疏继发”，就是从承政院接二连三地发出了文书。

议政府下设吏、户、礼、兵、工、刑六曹，类似于我国的六部。其首长称判书，相当于我国的尚书。其下有参判和参议。司宪府和司谏院是检察谏议机构。

“初九日，行花煎荐新。”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页）

原书上有注曰：“花煎荐新”。

“荐新”是一种祭祀。当果菜米谷刚刚成熟的时候，自己不食用，而是先到神主或者先人牌位前设供祭祀。该仪式称为“荐新”。今日是重阳节。重阳节在古代朝鲜也是重要的节日。选择在今天祭祀先人，是把祖先当成远行老者的意思吧？

“初十日，东郊陵行动驾，当日还宫。”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页）

1881年11月1日，高宗去东郊祭祀陵墓。

“十二日，晓政，户议前望添书。贱名落点。感祝，感祝。

申后有推鞠之命。

领选使盘缠下。米二十石、白绵绌六匹、白棉十五匹、正布十五匹。各项代钱五百七十五两一钱三分。又别简求请各种代钱一百八十两六钱六分。白棉四十五匹。又以户曹参议别路费各种

代钱二百五十两九钱九分。官参四两，代钱三百二十两。”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2页）

原书说，1881年11月3日早晨，高宗准备提升金允植为户曹参议。在朝鲜王朝里，“六曹参议”是从三品的官员。金允植对此十分感激。

但《高宗实录》无提升金允植为户曹参议的记载。相关的记载是，高宗提升金允植为吏曹参议。实际情况应是，本来准备提升金允植为户曹参议的，后改为吏曹参议。

下午，高宗对于审讯有新的旨意。随后，领选使的盘缠发下来了。金允植拿到的多是实物而不是现金。领选使的盘缠大致是一千三百两。

“户曹”与“吏曹”相当于我国古代六部里的“户部”与“吏部”。当时的朝鲜王国名义上以中国为宗，其六部都称为“曹”。其六曹设于景福宫前的大路两侧。

“十三日，晓，赴阙肃谢。

今日真殿茶礼亲行。”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2页）

早晨金允植去王宫谢恩。

今日，高宗亲自在真殿行茶礼。在《高宗实录》以及其他的《朝鲜王朝实录》里，关于行“茶礼”的记载很多。“真殿”就是挂有祖先画像的大殿。行茶礼，就是祭祀祖先。

“十四日，阴，微雨。夕饭后，入壮洞。会于汉山（徐衡淳。

原注）台丈宅。饮酒赋诗。汉山丈为饯余之局。归云从氏、石樵、巴江（金翊镇·尹秉鼎。原注）、听水、玉居（尹秉观。原注）、兰皋、兰坡（洪时模。原注）来会。天明还家。”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2页）

在出发前的一个晚上，金允植来到了居住在壮洞的徐衡淳的家里。徐衡淳为他设宴饯行。大家饮酒赋诗，直到天亮。

徐衡淳（1813~1893），字稚平，号汉山，祖籍大丘。1853年科举及第，历任弘文馆副校理、成均馆大司成、工曹判书、汉城府判尹等职。1860年以后，曾经两次出使中国。1885年以后，任判义禁府事、礼

曹判书和判敦宁府事。

尹秉鼎（1822~1889），字士弘，号巴江，祖籍南原。1851年文科及第，1861年以后历任成均馆大司成、礼曹参议。1885年以后，任工曹判书、吏曹判书、判义禁府事、判敦宁府事、汉城府判尹等。著有《巴江遗稿》。

“归云从氏”是指金允植的堂兄金晚植。金晚植（1834~1900），字大卿、器卿，号翠堂，祖籍清风。1869年文科及第。后作为修信副使与朴泳孝赴日本。历任各曹判书。曾经出使中国。1886年到1889年任汉城府判尹。

“听水”即洪在鼎，“兰皋”就是姜世馨。见金允植本月十九日记录。洪在鼎与姜世馨都是当时的士大夫子弟，社会名流。

“十六日，阴雨。”

十五日，微雨大风，行焚香。”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2页）

显然，原书将金允植日记的顺序搞颠倒了。

“十七日，大雷电以雨，如长夏注霖。”

十八日，阴。”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2页）

“如长夏注霖”的意思是说，尽管是农历的九月了，大雨还是如同漫长的夏天雨季的雨水那样大。朝鲜的气候是典型的半岛气候，夏天雨水很多。其首都首尔（汉城）尤其如此。

“十九日，晴时入壮洞听水（洪在鼎。原注）宅。汉山、瑞庵（李寅尚。原注）、石樵、巴江、冽陵（申观朝。原注）、玉居、兰皋（姜世馨。原注）、兰坡及余从兄弟皆会。为余饯饮之局也。”

日暮，剔灯题诗。家隶来报，余蒙三铨除授，又有政命促还。急起还谏洞。

吏曹重徒来到。院隶持牌来。祇受后即为治疏。使书吏缮书之际，又闻参判、参议前望。更入为教。未知处分之如何。书毕而待之。罢漏时，曹吏来传前望入之。参判朴齐宽，参议余复蒙